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人物志

铁肩担道义

□ 徐问笑

对于一个喜爱读史的人而言，历史绝非只是一种刻板的讲述，它在展现朝代更迭兴亡成败的同时，更多着墨于无数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那些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篇章，也正因为这些人的一一登场，才得以演绎出来。中国几千年之历史所记载下来的，帝王将相固然不少，但支撑每一段历史的，却更多是一些小人物，及他们的一些不平凡表现。因此，纵使他们既没有开疆辟土、平定天下的不世之功，也没有救民于水火、挽国于危局的突出贡献，但是，他们却照样可以让自己的名字，不朽于世。明代嘉靖朝的杨继盛，即是如此人物。

“风吹枷锁满城香，簇簇争看员外郎”。这是杨继盛于朝审途中所拟之诗句，既是一种悲情自勉，亦是真实场景之写照。当他拖着因受酷刑而残破不堪的身躯，去接受一场注定非正义的审判时，身上虽戴着沉重而罪恶的枷锁，却因为主人公大义凛然的精神，舍生取义之品质，而迸发出高洁的人格光辉，引得大家争相围观且为其鸣不平。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奇迹的发生，希望正义得到彰显，“英雄”能够立刻解脱于枷锁之下，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尊重。

然而，可惜的是，“刀下留人”之峰回路转式的正剧结局，往往只能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之中。因为，真实的历史是客观且残酷的，而杨继盛的对手，却是在历史上同样赫赫有名的严嵩。

公元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严嵩以构陷之方式，污蔑曾对其有提拔之恩的内阁首辅夏言，使得这位正直敢言的阁臣含冤弃市。夏言一死，其拥有的内阁地位和权力，自然也就被觊觎已久的严嵩取而代之了。此时的严嵩已是63岁，本来，因古人平均寿命皆很低，故其能以如此之“高龄”入阁拜相，且掌握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这实在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老年版励志题材了。然而，却因为他臭名昭著的历史评价，“大器晚成”在这里，却被解读成了祸国之奸贼，老而不死。

更令人头疼的是，他还有位手段、智谋与精力皆相当了得的助手与智囊，即其子严世蕃。严氏父子一体同心，其祸国之严重程度，绝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能概括，故朝中有人干脆以“大丞相”“小丞相”称呼这对父子。因此，沈炼弹劾严氏父子时，更以“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形容严氏为祸之烈。可惜沈炼的直言上谏，却换来被廷杖数十、贬去塞外种田的下场。

沈炼带着一腔的忠节大义与不甘，黯然地离开了京城。随后不久，曾因弹劾仇鸾，上书《请罢马市疏》而被贬谪在外。又随着仇鸾事败重获起用的杨继盛，同样怀着一腔的忠节大义，再次回到了京城。一年之内，连迁四职，这事要搁在一般人身上，那真是称得上“春风得意”了，可是杨继盛这位先生，全然没有失而复得且更受重用的庆幸和欢喜，也没有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的识趣和世故。相反，虽有沈炼等人弹劾不成，反遭迫害的不幸遭遇在前，但他却仍以“飞蛾扑火”般的殉道精神，明知“不可为”，毅然而又决然地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大十罪”，历数其擅专国事、贪贿纳奸、结党营私、吞没军饷等罪状。更向皇帝直言指出，满朝尽皆为嵩之奸党，严氏之权已甚于皇权。

杨继盛的此次上疏，有别于之前任何一次的弹劾，可谓句句切中严氏父子的要害，引起了严氏父子极大的恐慌和不安，他们对杨继盛简直恨之入骨，急欲杀之而后快。而此次上疏，在朝野与民间引起的轰动，亦可谓空前，所以，嘉靖帝并没有立刻下令处斩杨继盛，而是在廷杖之后，把他关进了诏狱。

诏狱，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场所，但于杨继盛而言，却是他生命中的“二进宫”了，之前弹劾仇鸾时，他就已体验过一次诏狱之恐怖了。然较之于上次，这一次再进诏狱，却是更加凶险，因他承受了连续两次共计140棍的廷杖（据明史统计，有明一代，死在廷杖之下的臣子，并不在少数）。杨继盛第一次被打40大棍后，已然身受重创，因此，当仅事隔两天，还要再打100棍时，他的友人王诰担心他受刑不住，会直接丧命，就设法弄来一副蛇胆，让他受刑前吃下去，以减少痛苦。但硬气的杨继盛却拒绝了，他说“椒山自有胆，何须蛇胆”，于是仅饮酒一杯，“遂谈笑赴堂受打”。

看到这里时，一个“硬汉”的形象已跃然纸上了。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硬汉往往是充满江湖味的，代表着武人式的快意恩仇，然而在这里，杨继盛却以一个文臣的身份，愣是演绎出了“硬汉”之悍勇与无畏。且到后面，他的行为，让一些“硬汉”亦不能不心生敬畏。

而杨继盛终因受刑太重，于入监当夜，“遂昏不省人事……忽然而死，忽然而苏，如睡又醒……”。虽他于后半夜，咬牙用瓦尖放血十数盅，勉强支撑不死。但恶劣的环境，兼之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与休养，使得他的伤势迅速恶化，两腿于数日后便“溃肿如小瓮，毒气上攻，口舌生疮，不能饮食，势已危矣”。在这种情况下，为求得一线生机，他竟用碎瓷片，自行从臀部及腿上一点点剜下腐肉，足三斤有余，后又忍痛将腿上两根残筋割断。

无法想象，他到底凭着怎样的一种意志力与忍耐力，自行完成这种挑战人体极限的“手术”的。须知，这些行为，可不是在明亮干净无菌的手术室中进行的，而是在没有采取任何消毒措施，也没有麻醉手段的情况下，于昏暗阴森、与蟑螂老鼠死尸为伍的监狱里发生的。据史载，说他在自行割肉时，站在一旁举着灯的狱卒，吓得手足颤抖，一度拿不稳手中的灯，差点掉到地上。要知道，能够在诏狱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工作的人，绝非胆小之辈，可是就连这人间地狱的“鬼差”都快被杨继盛吓得胆破色变，站都站不稳，连声惊呼：“关公割肉疗毒犹藉于人，不似老爹自割者。”只能说，杨继盛异于常人的坚强表现，已远远超出人类正常的感官承受范围，故近乎于骇人听闻了。

杨继盛不怕死，以身报国是他毕生之所愿。然而，但凡有一线生机，他却又从不轻易放弃，以至于有着一种近乎于“狠劲”的执着。从他临刑前给妻儿留下的遗书，可以看出他对家人的百般不舍和牵挂。他放心不下性烈的夫人，怕其跟着殉节，故句句晓之以理；他又不放心两个尚年幼的儿子，既怕他们不能成才，又怕兄弟们因疏于长辈教养，而致日后感情容易失和，甚至连儿子各自娶妻后，妯娌相处之细节都一一教导与叮嘱，且字字动之以情。可以说，作为丈夫，他情深意重；作为父亲，他又用心良苦。

不独对家人如此，他对待师长、友人及辖下百姓，也是有情有义。他曾在塾师得了瘫痪病时，不但日侍汤药，而且甘愿承受着忍饿挨冻、日夜不停歇的辛苦，徒步于百里外请医。他曾在寄住寺庙读书而主僧不幸身染瘟疫时，面对其他人皆吓跑，而其兄亦催他速归的情况下，却甘愿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毅然留下来照顾该病僧，为其“亲供饮食、遍求医药，夜则同寝二十日”。他曾经在贬谪狄道后，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让夫人张贞传授纺织技术，且为支持当地教育，用自己的俸禄为学子们置地，费用不足时，他甚至通过卖马和夫人的首饰来凑，因此当地人皆尊称他为“杨父”。

由此足见，杨继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真正做到了事君之至忠、事民之至诚、事师长之至孝、事友之至义、事亲之至情。回顾他10岁那年，其父因无酒招待客人，故以“无酒是穷主”自嘲时，杨继盛却脱口对出一句：“有儿是名臣。”或许这一刻，便已经预示了他一生之命运吧。而他于临刑的前一晚，在诏狱的墙壁上，所留下“铁肩担道义，辣手作文章”这十个大字，更与杨继盛之名一道，为万世传颂。

史 镜

司马迁的四原则

□ 张学博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其实不全面。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而且商人成为了一个横跨政治商业的非常有权力的阶层，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司马迁对道家经商治国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提炼，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可以归纳出国家治理经济的四个原则：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这与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供给学派是不谋而合，而且更为系统。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相关内容的研究。李埏认为：“春秋战国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汉兴之后是商人阶级的长成阶段；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产生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并最终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大革命；中国古代的商人阶级依《货殖列传》主要应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群体。”《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任玉梅认为司马迁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欲望动力说，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农、虞、工、商并重，阐明了货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张放任开拓，竞争经营，繁荣百业，阐明了货殖活动的多样性；四是阐述了货殖的规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动对富国富家的意义，阐述了货殖的规律性。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司马迁对于道家治国的推崇，这与后来汉书中班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司马迁定理，可以研究中国道家的经济治国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而发现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之处。

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西汉初期，此时的治国思想以黄老思想为主。在《货殖列传》的篇首，司马迁在指出了“《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欲穷刍豢之味，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这一社会现象之后，紧接着便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实际上，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温饱，而开始追求更多欲望的满足。在商鞅废止井田之后，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开始出现了职业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越国权臣范蠡，都是当时的巨富。司马迁则独辟蹊径，从个人出发，以“利”为基，认为追求财利是一切人的共同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基于个人理性的基础，司马迁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则“（财富）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对于社会经济治理，善者应是“因之”，相反，与民征利乃是“最下者”。

在司马迁提出的四个原则之中，善而因之是其基础与核心，要按照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办事，经济本身能够自我配置运行的，政府就不要插手。而且承认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善的欲望，应该予以承认而非贬低。其次是用利益来引导，用教育来引导，然后才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这四原则中最下者就是与民争利，即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中与百姓争利。因而司马迁是非常反对汉武帝时采用桑弘羊之策垄断盐铁之利益的。事实上，汉朝正是以汉武帝为分水岭，之前经济蓬勃发展，之后由于政府与民争利，最终走向衰落。

这四原则中，实际上对社会分工已经有了理论贡献，即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社会的分工，反对抑商思想，强调农、工、商、虞同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业是最有利的致富行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他把那些富商大贾称为“贤人”“能者”，大加赞赏，为他们立传。

从司马迁四原则来看，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家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传统认为道家完全是消极避世思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人物很多是道家人物，只不过他们多遵循功成而身退的思想，因而不为后世所铭记。如范蠡、张良、刘伯温、郭子仪等。道家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恰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要依靠制度而非个人来治理国家。道家主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主张愚民政治，而是富含辩证法思想的。道家主张政治要宽厚清明，则百姓也会比较纯朴，如果用严苛的政治权术治国，则老百姓必然奸诈。

“顺其自然”是司马迁四原则的核心，其含义就是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来治理经济，并非无所作为。而贯穿于四个原则的是用法律规则来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实现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的四项原则。温故而知新，鉴古可以知今。当此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新阅读司马迁，或许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用方言拯救电影

——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曹颖新）1月1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腊八节。就在这一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内，来自广东雷州的戏曲演员唱起雷州半岛的地方戏“雷剧”《梁祝》。中国第一个方言电影节——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以这种充满民俗文化特色的方式，拉开了帷幕。至此，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正式面向全国征集方言电影。

本次新闻发布会，主办方邀请到方言和电影的专家学者，开展了一场以“方言电影、地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会。

在会上，承办方茂德公集团董事长陈宇谈起了办电影节的初衷。他说：“在农村发展和地方文化发展中，方言借助了家乡互联网传播的威力，大有可为，尤其现在年轻导演都在各地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拍当地的风俗，拍各种影片。所以当时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给方言电影一个节日，这可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种愿望得到了电影业各界人士的支持，很快就酝酿出了这个电影节。从宗旨到架构，从丰厚的奖项设置到强大的评委库，可以说既接地气，又“高大上”。

比如，担任本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总顾问的是著名导演高群书。他的参与来自对凋敝乡村的惋惜：“现在乡村文化特别凋零，乡村文化越来越粗鄙，我们总是说故乡已经无法回去，因为它没有美好，田园风光消失了，美好的人情也消失了，更多的就是污染。”所以他想用电影的方式拯救乡村。他拍摄了电影《过年好》，即将上映。由赵本山主演，通过刻画返乡老人与去美国留学的外甥女的冲突，来展现社会观念冲突的现实。因为是赵本山出演，所以是以东北话为主。高群书想用方言电影来书写地方志，书写中国史。

评委会主席秦晓宇先生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他谈到，在很多电影中，方言的因素会被当做一种简单的、对人物进行贴标签的符号，或者是对人物制造笑料的表达，要么就是进行人物塑造的时候比较直白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地方风情的一种漫画式表达。“在很多的方言电影里，我没有看到把方言作为一种根源性的力量，能够在语言政治的高度上，把方言视为底层叙事的第一语言，或者是能够发挥出方言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的创造力。”但是对本届电影节的电影，他是有所期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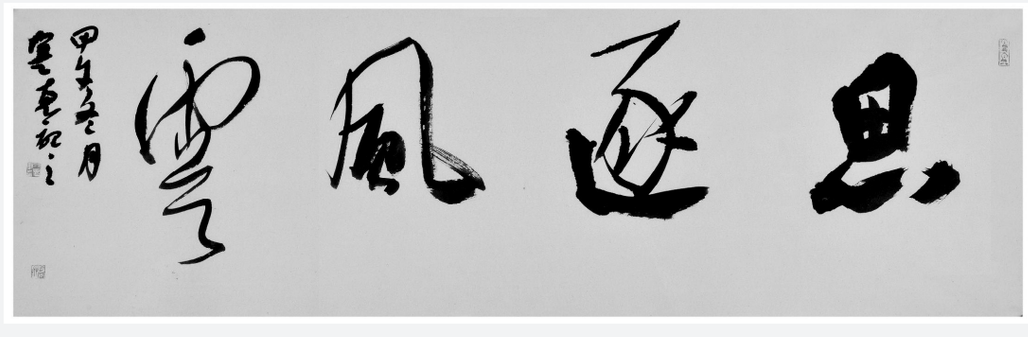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宝贤老师是研究方言的专家，她对方言做了一个学理上的说明。她首先认为，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是有价值的，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实际上是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地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珍惜，人们正在从保证文化的效果来调整态度。谈到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她说：“电影节是一种有力的保护方言的手段，虽然我不懂电影，但是我知道电影是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方言电影节把方言融入到电影当中，人们爱看电影，就会关注这里面的方言。”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谈到，方言对我国多中心文化生态具有保护作用。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好多个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中心能够全覆盖广阔的疆域。钱穆先生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很多东西平铺在这个疆域上，他觉得文化的辉煌，或者文化巅峰的创造，往往也不一定是在中心产生的，一些偏僻的角落和边缘的地方，可能会领导潮流，也能产生非常重要的文化创造。历史上有些很重要的文化社或者文化流派，曾经出现在某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文化绵延不绝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哪个中心一统天下，然后由它来领导，而是每个地方都有火种。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村、每一个角落都保存着非常复杂的基因。我觉得方言是多种基因的载体，尤其可以保障其丰富性。方言远比普通话好玩，保存了很多生机勃勃的东西。电影能够呈现出文化的细微之处，其实就和人物的方言有关。我觉得如果中国文化慢慢地被简化、被删除，这是中国文化的危机，所以借由电影这样一个大的媒介，又结合了方言这个特殊的载体，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一个国家，它的表情丰富了以后，才会更具吸引力。”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从方言与类型电影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电影是一种大众媒介，市场可能让很多个性化的东西丧失，使小的电影无处生存。方言则可以激活一些类型化电影，比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这里面都有方言的很大比重，可以说方言成就了类型电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道新教授从全球化的视野中去审视方言电影，他说：“我觉得电影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语言。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在英语的语言帝国统治中，在好莱坞霸权的文化氛围当中展开我们的电影工作。语言和方言电影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因此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思考，如何用电影拯救方言，同时如何用方言拯救电影，后者更重要。方言展示的底层性和民族性，可以与国族叙述进行连接，这是一个重要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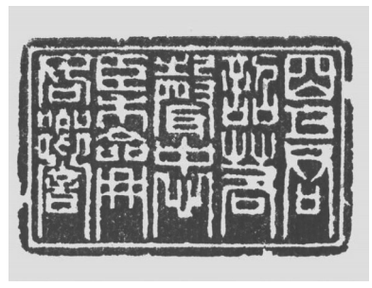
传媒大学教授何苏六是记录片研究专家，他从技术层面谈了方言与纪录片结合的价值，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方言突显了绝对的真实感，二是方言提高了影像的文献价值，三是说方言增强了拍摄团队成员之间的亲切感，四是方言对影像叙事有一个补充。他评价了方言在《舌尖上的中国》成功中的因素：“当时我就用四个词概括它的成功——乡音、乡思、乡愁和乡情。那时候大家不知道做什么，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的幸福指数都很低，突然发现一道美食，可能不是我老家的美食，但这可能会唤醒童年的记忆。这个纪录片从这个层次满足了人们的思乡之情。那时候晚上冰啤酒的销量大增，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纪录片就觉得应该吃个烧烤，喝个啤酒，突然发现幸福可以这么简单，爬到什么位置都没有味觉重要。不含添加剂的食材和亲切的乡音，填满了乡愁。”



作者：张实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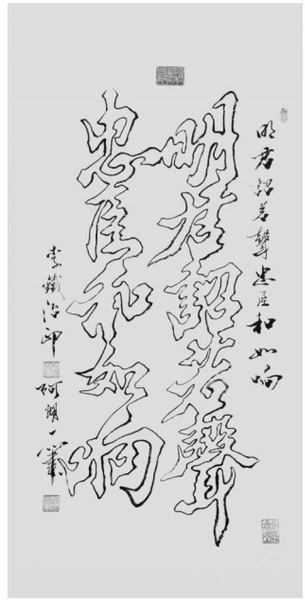
文化视野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作者：李铁

明君诏若声 忠臣和如响



作者：阿朗一笔